

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历史演变、成因及特点

王新刚 颜 鹏*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期叙利亚独立以来,军人政治主要是军人干政成为影响叙利亚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复兴党执政前,军人集团扮演的是原有社会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和革命者;随着复兴党的上台,军队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其政治角色趋于保守。阿萨德执政后,通过复兴党建立了一支“意识形态纯粹化”的军队,强化了对军队的控制和职业化。军队也由过去政治斗争的仲裁者变成政权的守护者,军事政变大为减少。军人政治大行其道与叙利亚社会的分裂性与社会权力真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叙利亚军队的构成、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趋向,以及地区政治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军人政治使叙利亚摆脱了独立初期政变频仍、政局动荡的局面,使叙利亚实现了长期的稳定。但是,从长期来看,军人政治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叙利亚的政治发展及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对地区军事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 叙利亚 军人政治 复兴党 阿拉维派 威权主义

军人政治是20世纪亚非国家政治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叙利亚也不例外。独立后,军人政治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出现在叙利亚政治舞台上,进而开启了军人干预政治的历史进程。叙利亚军队也由最初国内政治斗争的“仲裁者”转变为与复兴党相互倚重的力量。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兴起既有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也有地区、国际形势影响的外部因素。军人政治是影响当代叙利亚政治发展,以及地区局势的重要因素。本

* 王新刚,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颜鹏,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拟对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历史、演变、兴起的原因及主要特点进行考察,为进一步认识叙利亚乃至中东政治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一 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历史演变

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沿用了委任统治时期的议会民主制。当时沿用的1930年宪法明确规定,军队职责在于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而非介入政治,明确禁止军人进入议会。^①但叙利亚独立后,各种问题相继产生,文官政府难以维系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军人开始干预叙利亚的政治,从而开启了军人政治的先河。军人集团扮演的是原有社会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和革命者角色。随着复兴党的上台,军队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其政治角色趋于保守,成为复兴党政权的左膀右臂。

(一) 军事政变与军人独裁政权

叙利亚独立后,文官政府在处理国内外的的问题时缺乏必要的能力与经验,导致政局动荡。军人从幕后步入前台,开始频繁干预叙利亚政治。1948年,叙利亚在巴勒斯坦战争中惨败,军事将领和政治家们相互指责对方要为战争失败负责,战争也使叙利亚经济遭受重创。^②叙利亚领导人在战争期间挪用巴勒斯坦基金曝光后,更是激起了国民的愤怒。叙利亚政局开始动荡。1948年11月29日,联合国巴勒斯坦决议^③一周年纪念日当天,叙利亚学生罢课,并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示威和游行。叙利亚国民党政府被迫下台,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此时,美国也因美资公司投资的石油管道项目迟迟得不到叙政府批准而失去耐心,开始在叙利亚策划政变。

1949年3月30日,叙利亚军队总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上校发动现代叙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夺取叙利亚最高国家权力。^④扎伊姆政变打

① 王彤:《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289页。

② [苏]H. A. 穆希基诺夫:《现代叙利亚》,祝诚等译,北京出版社,1981,第75页。

③ 1947年11月29日,在英美的策动下联合国通过了第181号决议,规定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巴勒斯坦地区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两个国家。

④ Don Perez, *The Middle East Today*, Greenwood Press, 1994, p. 412.

破了叙利亚议会民主的政治模式，军队从此走上了国家政治的前台。这次政变经过细心的策划，除获得美国人的支持外，扎伊姆还许诺进行社会改革和与以色列战斗到底，从而赢得了叙利亚民族主义军官和阿克拉姆·胡拉尼及其追随者的支持。政变后，扎伊姆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他驱逐库阿特里总统，解散议会和政府，取缔包括国民党、人民党、复兴党、共产党等在内的诸多政党，实施党禁。

然而，扎伊姆缺乏统治的基础。首先，他既没有组建自己的政党，也未联合其他政治团体。他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试图扼杀政治活动，这就使得民众尤其是新兴社会团体疏远新政权。其次，扎伊姆许诺的社会改革也未实现。他任命来自哈马的大地主穆赫辛·巴拉兹出任内阁总理。这一举动疏远了社会的中下层民众。再次，民众本来就对美国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偏袒行为感到愤怒，对土耳其吞并亚历山大塔勒地区心存不满。但是扎伊姆作为亲美派军官，不但批准美国公司石油管道项目，支持美国提出的中东军事条约，还和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并改善同土耳其的关系。最后，扎伊姆在军队中重用库尔德人和切尔克斯人也激起了作为主体民族的阿拉伯人的愤怒，削弱了其执政基础。1949年8月14日，来自阿勒颇的军官穆罕默德·萨米·辛纳维在英国的支持下，与德鲁兹派及其他党派军官联手发动第二次军事政变，逮捕并处死扎伊姆。

辛纳维政变成功后，取消党禁，任命人民党的哈西姆·阿塔西组建新政府。1949年11月15日，叙利亚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准备起草新宪法。人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优势，在辛纳维授意下，阿塔西当选新总统，开始组建人民党政府并制定新宪法。辛纳维是亲英派军官，他上台后意欲使叙利亚与伊拉克统一，并准备实施英国支持的、哈西姆家族提出的“大叙利亚”计划。^①此后，叙利亚开始与伊拉克谈判，推进两国统一的进程。^②叙伊合并问题在叙利亚军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军官反对该计划，开始策划政变，阻止叙伊合并。美国也担心一旦叙利亚与伊拉克统一，将削弱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因此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军官发动政变。1949年12月19日，阿迪卜·希沙克里发动一年内的第三次政变，推翻阿塔西政

①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第216页。

② 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653页。

权。希沙克里称,他的行动是军队内部的一次“纠正”运动,目的是反对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合并。

1949年爆发的三次军事政变表明叙利亚政治精英、军方和社会之间,以及各自内部在亲西方和反西方、反阿拉伯主义与叙利亚国家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关涉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上皆存在严重的分歧。事实上,这些问题是叙利亚实现独立后,构建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叙利亚城市中的阿拉伯政治精英并没有能力使政局稳定下来。1949年的军事政变意味着政治精英开始失势,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也难以维系。军队则登上政治的前台,开始积极介入,甚至是形塑叙利亚的政治发展。

希沙克里政变后,军队虽然退居幕后,叙利亚还颁布了1950年宪法,但是叙利亚政府争吵不休,政局依旧动荡。一方面,坚持叙利亚与伊拉克统一的人民党反对军人干政,要求宪兵应由内政部控制而非军方控制,国防部长也应由文官担任,但遭到军队的拒绝;另一方面,人民党及其他保守政党敌视左派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对于军方未能镇压左派力量与农民运动感到不满。1951年秋,人民党的马穆鲁夫·达瓦里比(实为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取代哈桑·哈基姆出任内阁总理。不同于其前任,达瓦里比寻求人民党、国民党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拒绝与军方合作。他不理会希沙克里的要求,试图组建反对军人集团的新政府。希沙克里对此忧心忡忡,于1951年11月19日发动政变,推翻了文官政府。

政变后,希沙克里一改之前拥护议会民主制的态度,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他解散议会,逼迫总统阿塔西辞职,解散政党,实施党禁,压制新闻自由,曾经支持他的复兴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党也未能幸免。此外,他还禁止学生、教师、工人和公务人员参与政治活动,取消最高法院并加强警察控制。希沙克里通过这些举措颠覆了之前的议会民主制度,将几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于军人之手,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

希沙克里希望通过摆脱外国势力的干涉和改善宗教、民族、部落的分裂状态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统一国家。希沙克里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军队的现代化,强化军队对他的支持。为此他开始推进军队改革,提拔年轻军官。希沙克里的军事改革客观上激发了年轻军官参与政治的热情,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利益局限在军营之内。同时,随着叙利亚军备的发展,军队的民

族主义情感更加强了，消灭以色列夺回巴勒斯坦的信念更加坚定。^①然而，这些年轻军官并未如希沙克里所想成为其统治的支柱，反而在后来推翻希沙克里独裁统治的政变，以及其后的历次政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希沙克里的军事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军人政治。

此外，希沙克里废除部落酋长的特权，同化少数民族，但所采取的政策并不得当。1951年希沙克里公开建立了中东地区第一个由军队主导的政党——阿拉伯解放运动，但没有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阿拉伯社会党和复兴党虽然被禁止活动，但仍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并且得到部分军官的支持。希沙克里为此逮捕阿拉伯社会党和复兴党党员，胡拉尼等领导人逃往国外，一些军官也被指控密谋政变。为了获得政权的合法性，1953年7月希沙克里操纵公民投票，通过了新宪法，确立了总统制，希沙克里当选叙利亚总统。1953年10月9日，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选举前取消党禁，但是大多数政党抵制此次选举的事实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的到来。希沙克里的强硬手腕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早在1953年6月，百余名政治家和工商界领袖敦促希沙克里结束个人专权，恢复政治自由。国民党、人民党、复兴党、阿拉伯社会党、共产党等相互敌对的政党联合起来，签署《民族宪章》，宣称推翻希沙克里政权。在胡拉尼的影响下，部分军官们参与其中。^②同时，另一部分军官自诩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指责希沙克里及亲信给叙利亚国家和军队带来了耻辱。至此，希沙克里的民心已丧失殆尽。

1954年1月，德鲁兹人率先发难，反抗希沙克里的独裁统治。随后，阿勒颇的学生也进行罢课和游行示威。社会动荡很快蔓延至叙利亚全国。1954年2月25日，阿勒颇的军官穆斯塔法·哈姆敦发动军事起义，除大马士革的卫戍部队外，其他军队纷纷响应。希沙克里被迫辞职，流亡国外，其独裁统治也宣告终结。希沙克里的军事独裁是在议会民主制难以维系的背景下建立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叙利亚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但希沙克里以个人权威为基础的军事独裁未能弥合叙利亚社会的鸿沟和政治分歧。尽管在1954年的政权更迭中，民族资产阶级集团、小资产阶级各阶层、

^① Gordon H. Torrey, *Syrian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1945 - 1958*,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36.

^② Tabitha Petran, *Syria*,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pp. 103 - 104.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等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①但是给予希沙克里致命一击的仍然是军队。可以说,希沙克里的成败皆源于军队。因此,希沙克里将军人进一步引入叙利亚的政治发展当中,使叙利亚军队成为一种公开的政治工具。^②

(二) 军人干政与泛阿拉伯主义实践

希沙克里独裁统治被推翻后,叙利亚又回归议会民主制度。哈西姆·阿塔西出任总统,国民党领导人萨布里·阿萨里出任内阁总理,准备进行新的议会选举。临时军事委员会宣布:“军队返回军营……接受共和国总统和合法政府的管理。”^③1954年9月,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虽然只有40%的选民参加投票,但此次选举仍然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第一次自由选举。选举结果表明叙利亚的政治力量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传统政治势力开始衰落,人民党和国民党影响力大幅下降;其次,新兴左翼政党和中间独立派力量增强并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较多席位,如复兴党和阿拉伯社会党合并后力量大为增强,在选举中赢得22个议会席位,哈立德·阿兹姆领导的中间派获得38个席位。1955年8月,叙利亚举行总统选举,舒克里·库阿特利当选。库阿特利在埃及流亡期间与埃及军方建立了紧密关系,他能够赢得总统大选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他得到了埃及的支持。特别是,埃及总统纳赛尔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军火协议,打破了西方的武器禁运。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的战绩又使纳赛尔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叙利亚国内的泛阿拉伯主义也迅速发展,阿拉伯国家的联合似乎成为解决叙利亚政治发展难题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叙利亚疏远英美等西方国家,拒绝加入美国组织的“巴格达条约组织”。^④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试图与埃及实现合并,实现阿拉伯统一的梦想。

埃及起初对叙埃两国的合并持保留态度,纳赛尔一度拒绝复兴党关于

① [苏] H. A. 穆希基诺夫:《现代叙利亚》,祝诚等译,北京出版社,1981,第75页。

② 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 ~ 195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27.

③ 转引自 Hazimat Taghiyah, *Defeat of A Despot*, Damascus, 1954, p. 101.

④ 卢昊:《美英合谋控制叙利亚》,《晚报文萃》2012年第21期。

两国合并的提议，认为时机尚不成熟。^①复兴党把目光转向军队，寄希望于通过军队的力量实现两国合并。复兴党成员、叙利亚外交部部长萨拉赫·比塔尔认为，只有军方有所行动才能迫使纳赛尔接受与埃及的合并，于是鼓动军队中的复兴党成员对此予以推动。叙利亚军队成为推动叙利亚与埃及统一的主导力量。1958年1月12日，在没有告知叙利亚政府的情况下，叙军队总参谋长比兹里率领14人组成的军事代表团访问埃及开罗，就叙埃统一问题与埃及进行谈判。比塔尔为复兴党成员，极力推动阿拉伯统一。^②埃及总统纳赛尔在谈判中提出苛刻的统一条件，即两国完全统一，包括解散叙利亚所有政党，叙利亚军队完全退出政治活动。比塔尔对于埃及的主张不完全赞同，他希望以邦联的形式实现两国统一。但叙利亚军方其他代表支持纳赛尔的主张。叙埃谈判在叙利亚国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和总理阿萨里对军方绕开政府的行动十分不满，认为与军事政变无异。叙利亚议会则支持叙埃统一。国内舆论使库阿特利感到他们别无选择，于是被迫同意军方的行动，否则国家将有陷入动乱的危险。1958年2月1日，叙埃两国共同宣布“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下称“阿联”）成立。

不难发现，军人在“阿联”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官政府形同虚设。就深层而言，这表明阿拉伯主义，尤其是主张阿拉伯统一的复兴党已对叙利亚军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前者试图通过阿拉伯世界的联合寻求解决叙利亚乃至阿拉伯世界政治发展的问题。然而，这种尝试同样未能成功。“阿联”建立后，叙利亚军队退出政治领域。但埃及却开始排挤叙利亚人，打压叙利亚政治领导人和军官，政府要害部门也都被埃及人控制。从1958年3月开始，埃及人首先清洗了军中有威望的军官、共产党人，接着是进步人士，然后是复兴党及其支持者，最终任何反对“埃及化”的军人都被清洗出军队，甚至连叙利亚为巴勒斯坦培训的75名巴勒斯坦军人也被清洗。此外，埃及还废除了叙利亚的征兵制度，解散了叙利亚空军，并将叙利亚军事学院与空军学院转移至埃及。据统计，叙利亚与埃

① 李聪文：《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兴衰探析》，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第4页。

② Gordon H. Torrey, *Syrian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1945 - 1958*,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40.

及合并期间,约2800名现役和非现役军官被解职、调离,军官人数减少一半。^①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埃及军官被任命为叙利亚军队的领导人。

埃及的这些举措严重伤害了叙利亚军人的感情。叙利亚军人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认为在叙利亚的埃及军官事实上就是秘密警察,其任务是监督叙利亚的同僚。一名叙利亚将军抱怨道:“在合并期间,埃及军官几乎都行事傲慢,觉得他自己就是贾马尔·阿卜杜拉·纳赛尔,叙利亚军官士气如此低沉,他们一直寻求脱离埃及的控制。”^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复兴党军官建立秘密组织,策划发动政变以脱离埃及。与此同时,埃及在叙利亚推行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运动也严重侵害了叙利亚大地主与大商人的利益。他们对埃及的统治十分不满。1961年9月28日,在叙利亚地方集团的支持下,大马士革的逊尼派陆军中校阿卜杜勒·卡里姆·纳赫拉维发动政变,驱逐埃及官员,废除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的相关政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宣告解体。^③政变后,纳赫拉维将“阿联”时期担任大马士革工会总书记的库兹巴里扶上了总统之位,组建了由国民党、人民党、商人、律师组成的临时政府。纳赫拉维表面上退出政坛,但是很快组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幕后监督临时政府。纳赫拉维军人集团保留《紧急状态法》,取缔政党,主张建立人民阵线以支持“革命的原则”,取消出版等自由,并拒绝数以千计的被“阿联”政府清洗的官员复职。

(三) 复兴党与“军政合一”体制的构建

1961年,叙利亚爆发军事政变,脱离“阿联”之后,叙利亚又回到了独立后政治发展的原点。1961年12月,在叙利亚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人民党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派,通过联合其他政党组建新政府。传统的城市商人和大地主再次回到了权力的中心,新兴的左翼力量遭到排除。^④但这仍然未能解决叙利亚政治发展的根本问题,左翼与右翼政治力量、“统与独”、

① *Watha'iq Mou'tamar Shoutura (Documents of the Chtoura Conference)*, Syr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House, Damascus, 1962.

② Gordon H. Torrey, *Syrian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1945 - 1958*,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42.

③ M. E. Yapp, *The Near East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A History to 1995*, Longman, 1996, p. 252.

④ 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655页。

军队与文官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各派的冲突十分严重，叙利亚政局动荡。1962年，叙利亚相继爆发了三次军事政变，其目标十分复杂，大致包括：实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效仿希沙克里建立军人独裁政权，继续与埃及合并，等等。这些目标都与大商人和大地主的利益格格不入。这表明无论是军事独裁、阿拉伯统一，还是议会民主制度都难以使叙利亚政局稳定下来。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复兴党开始与军队结成联盟，逐渐形成了军政一体的制度，最终使叙利亚摆脱了政局的动荡。在“阿联”时期，叙利亚复兴党解散了在军队中的组织机构，许多军官被解职或调往埃及。部分驻埃及的复兴党军官不满自己的处境，相互之间秘密保持联系，希望把握时机恢复自己在军队中的权力和地位。在此背景下，1959年复兴党军事委员在埃及秘密成立。复兴党军事委员会成立之初只有五名成员，他们全部来自少数教派，其中有三人是阿拉维派，两人是伊斯玛仪派。起初，军事委员会处于秘密状态，为了免受复兴党文职领导人干预和控制，保持自身独立自主，它甚至没有通知复兴党领导人。军事委员会这种少数教派的属性，以及对复兴党政治领导人的疏离，成为后来复兴党内部分裂的重要原因。

与复兴党政治领导人不同，军事委员会主张叙利亚脱离“阿联”。当“阿联”解体，军事委员会成员回到叙利亚后，他们又因其复兴党的身份而遭到传统政治势力的排挤，大部分复兴党军官被清洗出军队。于是，复兴党军事委员会选择与纳赛尔主义者合作，于1962年成立政变领导委员会，包括三名军事委员会成员、两名纳赛尔主义者军官和一名独立派军官。^①该委员会的目标是推翻叙利亚政府。与此同时，1963年，伊拉克复兴党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执政极大地激励了叙利亚复兴党。此时，叙利亚总理阿兹姆病重，多名部长离开内阁，叙利亚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复兴党夺取叙利亚政权的时机成熟。1963年3月8日，齐亚德·哈里里上校发动不流血政变，接管叙利亚政权。政变成功后，由军人组成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该委员会由20人组成，包括12名复兴党军官、8名

^① 孙杉：《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军事委员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硕士论文，2011，第13页。

纳赛尔派及独立派军官。^①复兴党通过与军人联合夺取了叙利亚政权。

复兴党在经历“阿联”时期的打击后，其组织基础较为薄弱，成员不到500名。复兴党政治领导人与军人之间也存在芥蒂，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在军队中也缺乏独立的组织机构。故此，当复兴党军人掌控政权后，着力扩大自身的统治基础。一方面，复兴党军人开始与复兴党政治领导人合作，在保留军事委员会一定独立性的同时，将之纳入复兴党的体制中；另一方面，军事委员会也开始在军队中大肆扩张，清洗异己力量，以便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军队中关键职位基本由军事委员会成员占据，贾迪德出任军事事务局局长和人事局局长，哈菲兹·阿萨德成为空军司令。他们利用自身的权力建立了一支复兴党控制下的军队。^②

与此同时，复兴党成功地把其他军人集团从政府和军队中清除出去，实现了对叙利亚政权的完全控制。军队中首先被清洗的是纳赛尔主义者。纳赛尔主义者政变第三天就要求尽快实现与埃及的再次合并，并着手进行谈判。此举遭到复兴党军官的反对，并成功地将公投延期25个月。1963年4月下旬当纳赛尔主义者在阿勒颇发动叛乱抗议公投延期时，复兴党清洗了军队中47名纳赛尔军官，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复兴党政权借内阁中纳赛尔主义者辞职之机重组政府，同时抓捕纳赛尔主义者的领袖。^③此后，以哈里里为代表的独立派军官成为清洗对象，哈里里在出访阿尔及利亚的途中被解职，派往叙利亚驻美国使馆担任武官。亲复兴党军官的阿明·哈菲兹成为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自此，复兴党成功清洗了革命指挥委员会和政府中的异己力量。

1963年，叙利亚爆发的“三·八革命”，使脆弱的议会民主制退出了历史舞台，复兴党通过与军人的联合最终掌控了叙利亚政权。这成为叙利亚政治发展的分水岭，^④叙利亚由此建立了军政一体的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最终也使叙利亚逐渐摆脱了政局动荡、军事政变频发的局面。然而，复兴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以阿弗拉克、比塔尔等为代表的元老派领导人出

① John F. Devlin, *The Baath Party: A History from Its Origins to 1966*,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6, p. 238.

② John Galvani, "Syria and the Baath Party," *MERIP Reports*, No. 25, 1974, p. 6.

③ Tabitha Petran, *Syria*,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p. 169.

④ 哈全安：《中东史》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658页。

身城市的中产阶级，主要为逊尼派穆斯林。他们反对军队干预政治，认为军队应该成为复兴党进行统治的工具，军官应该辞去在党和政府中的相应职务。这意味着军队应当由复兴党的政治领导人控制。元老派还主张阿拉伯统一高于一切。以贾迪德和阿萨德为代表的少壮派军官大多属于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等少数教派，出身农村。他们的思想更为激进，强调社会主义尤其是土地改革和国有化。^①同时，少壮派反对将阿拉伯统一放到优先地位，特别是反对元老派对于军队的控制。故此，由于所属的教派和社会阶层不同，复兴党两派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巨大差异。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两派尚能团结一致，但当复兴党剪除政敌、独揽政权之时，两者的联盟很快瓦解。1966年2月23日，少壮派军官萨拉赫·贾迪德、穆罕默德·乌姆兰、哈菲兹·阿萨德发动政变，囚禁阿明·哈菲兹以及阿弗拉克、比塔尔等元老派成员，并将他们从复兴党中开除。^②至此，叙利亚政权完全控制在复兴党军人手中。

（四）阿萨德与“军政合一”体制的巩固

1966年，复兴党少壮派驱逐元老派之后，少壮派内部的矛盾又凸显出来。1966~1970年，复兴党内形成了贾迪德和阿萨德两派力量。前者主张推行社会主义制度，对外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运动，^③后者的立场则相对温和，主张以叙利亚国内建设为主。贾迪德政府的激进政策造成了严重影响。叙利亚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惨败，激化了两者的矛盾。1970年，阿萨德发动不流血政变，派军队占领党政机构，监禁贾迪德等高级政治领导人。叙利亚由此进入长达30年的哈菲兹·阿萨德时代。

阿萨德上台后首要任务是如何解决叙利亚独立以来政变频发、政局持续动荡的问题。他严格控制复兴党在军队中的政治活动，确保自己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阿萨德通过各种手段安抚军官集团及军队，防止军事政变的发生。正如一位叙利亚学者所言：“如果军队决意发动一场政变，那是因

① R. Hinnebusch, *Syrian: Revolution from Above*, Rutledge, 2007, p. 49.

② D. Hopwood, *Syria 1945 - 1986: Politics and Society*, Unwin Hyman Ltd, 1988, p. 47.

③ John F. Devlin, "The Baath Party: Rise and Metamorpho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1 December.

为他们的需求被忽视了。”^①阿萨德提高军人的待遇并给予他们许多特权。军官享有丰厚的薪水、免费医疗、旅游津贴,以及各种各样的额外福利。阿萨德执政后,军队规模逐渐膨胀,国防预算逐年增加。1979年,叙利亚的国防预算已超过10亿美元,为预算总额的25%以上,军队的规模达到23万。军人是阿萨德政权下的既得利益者,成为叙利亚政治、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因而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另外,阿萨德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巩固统治,组建了2万人的完全由阿拉维派构成的特种部队。这支部队与其他部队互不统属,装备最先进的武器,直属阿萨德统辖。这支部队成为阿萨德维护个人及其统治集团人身安全、镇压反对派的中坚力量。1982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哈马发动叛乱,阿萨德出动的就是特种部队,仅用两周就平息了叛乱。

尽管阿萨德出身军旅,通过军事政变获得政权,但其统治却非一般意义上的军人独裁统治。他巧妙地将叙利亚的政治制度、复兴党以及军队结合起来,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在阿萨德治下,总统处于权力的中心,军事安全机构、复兴党组织和行政官僚机构成为阿萨德统治的三大支柱。三者相互独立,并相互协调、彼此联系,成为调节社会内部冲突,进行政治控制和社会整合的最主要的工具。^②军事安全机构主要由军队、警察、情报部门构成,该机构是阿萨德政权最忠诚的捍卫者,同时也是阿萨德争取支持、进行政治控制的重要工具。1970年叙利亚武装部队只有8万人,到2011年现役人数达29.5万人。^③军事实力在阿拉伯世界位列第三。安全机构及下属部门规模巨大、人数众多,人员主要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青年,从而客观上扩大了阿萨德政权的社会基础。阿拉维高级军官是军事安全机构的核心。他们皆为阿萨德的亲信,把持着最为重要的军事战略部门。逊尼派军官不足军官总数的1/4,而阿拉维派军官却超过军官总数的1/2,内务警察和情报人员也大多来自阿拉维派。^④阿萨德胞弟里法特·阿萨德曾经是仅次于总统的二号人物,长期领导特防卫队。阿萨德的女婿阿德南·

① Robert Olson, *The Baath and Syria 1947-1982*, The Kingston Press, 1982, p. 124.

② 王希:《阿萨德政治体制简析》,《西亚非洲》2003年第3期。

③ *Syrian Armed Forc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yrian_Armed_Forces.

④ M. E. Yapp, *The Near East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A History to 1995*, Longman, 1996, pp. 256-262.

马赫鲁夫控制着总统卫队。另外，特种部队司令、情报局局长、第一师、第三师师长等全都是阿拉维派军人。除阿拉维派外，复兴党中非阿拉维派军官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对阿萨德本人的效忠，并无独立的社会基础。^① 例如，前总理阿卜杜勒·拉乌夫·卡塞姆和前国防部长穆斯塔法·塔拉斯等。此外，阿萨德将复兴党改造为驯服的统治工具，其组织机构延伸到各种社会组织之中，从而扩大了阿萨德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同时，许多军界要员往往兼任复兴党的高级职务，军人在复兴党党员中的比例高达 10%，这就保证了军队对复兴党的有力影响。

阿萨德通过军队的“复兴党化”，军队和复兴党的“阿拉维化”，使他成为军队、政党和政府的核心，从而解决了叙利亚独立以来一直存在的军队与文官政府、军队内部、不同党派之间的严重冲突。这在客观上使叙利亚摆脱了军事政变频发、政局动荡的局面，政治局势渐趋稳定。阿萨德成为“叙利亚历史上第一位有效控制军队，但却又不被军队控制的政治领袖”。^② 然而，阿萨德构建的复杂的统治模式本质上是威权主义的制度，他依赖自身的权威，以及对复兴党和军队的控制。20 世纪末，阿萨德通过清洗军事安全部门以及政府中的元老为其子巴沙尔接管政权扫清了道路。2000 年，阿萨德去世后，巴沙尔不仅继承了其父的职位，而且也继承了阿萨德构建的整套军政体系。

2011 年 3 月，当阿拉伯剧变波及叙利亚后，叙利亚迅速陷入政治冲突和内战之中。可以说，叙利亚危机的爆发与阿萨德建立的威权主义的军政体系有着深层的关联。它使权力高度集中于复兴党尤其是阿拉维派和巴沙尔家族手中，但却使叙利亚的主体教派逊尼派阿拉伯人缺乏政治参与机会。当社会经济问题、政治参与及外部因素相互叠加时，叙利亚冲突便不可避免。因此，20 世纪后期，阿萨德构建的“军政合一”的威权制度使叙利亚摆脱了政局动荡，但并未解决叙利亚政治发展的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在多元社会中构建民族国家的问题。可以说，当前叙利亚危机与内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源于叙利亚军政关系的长期积弊。另外，巴沙尔政权之所以能够在危机中坚持至今也与叙利亚这种军政合一的体制有关。这种制度将党派

① Hanna Batatu,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ocial Roots of Syria's Ruling, Military Group and the Causes for Its Dominanc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5, No. 3, 1981, p. 333.

② 吴炜：《阿萨德和叙利亚》，《世界知识》1994 年第 6 期。

的利益与教派、家族命运同一化,从而使巴沙尔政权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复兴党和军队成为维系巴沙尔政权最重要的力量。^①总之,叙利亚冲突使复兴党“军政合一”的体制难以为继,叙利亚似乎又回到了独立之初政治发展的原点。

二 叙利亚军人政治兴起的原因

叙利亚军人政治兴起的原因既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也有自身的独特性,可以说军人政治是叙利亚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产物,还是社会变革、民族主义诉求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亨廷顿所说:“军队干预政治的最重要原因不是来自军事方面,而是来自政治方面,它反映的不是军队体制在社会和组织方面的特点,而是社会在政治上和制度上的结构问题……这些原因并不存在于这些团体的性质上,而寓于社会的结构中,特别寓于国家有效政治制度的缺乏或软弱之中。”^②

(一) 多元分裂社会的政治权威真空

二战后叙利亚仍是一个典型的多元而缺乏凝聚力的传统社会。^③经济、社会、阶级、宗教、地区矛盾等相互交织,贯穿于叙利亚社会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在这种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中,传统的政治权威日益瓦解,新兴政治权威的力量尚不足以夺取统治地位,叙利亚国家政治生活处于权威缺失或者真空状态。传统权威的式微使得政治秩序一片混乱,各种政治力量为夺取最高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和军队的内讧成为叙利亚政治生活的常态。叙利亚分裂的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为军人介入政治提供了契机。军人集团成为动荡社会中最有能力收拾残局、改变社会现状的力量之一。

1. 复杂的社会矛盾

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叙利亚社会就已经被分割成许多相对封闭的阶

① 田文林:《军队干政:中东非典型政治中的典型现象》,《世界知识》2012年第3期。

②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62~163页。

③ 王彤:《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44页。

层，它们之间还存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地区分歧和矛盾。占据统治地位的逊尼派阿拉伯地主控制着叙利亚的政治与经济，掌握着对农村人口的绝对统治权，后者则是整个社会中最贫穷、无地少地的佃农。两大阶级集团间矛盾相当尖锐。逊尼派大地主大多居住在城市，拥有大量土地，普遍通过分成制的租佃方式剥削依赖土地的农民。绝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地主有时拥有高达几百个村庄的土地，村庄居民则像中世纪农奴一样依附于地主，地主对农民具有事实上的控制权。^① 地主和农民具有契约关系。如果农民使用自己的种子、农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他们能够获得收成的 50%；如果农民只进行生产的话，只能获得收成的 25%。在某些劳动力充足的地区，农民的分成甚至只有 16%。^② 此外，农民还需要为地主提供家务劳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进一步加剧了叙利亚社会的分化。委任统治当局将大量国有土地和部族土地赠予城市商人、部族谢赫作为私人地产，农民丧失传统的土地公用权，城乡社会的贫富差距随之明显扩大。^③ 独立初期，叙利亚绝大多数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他们垄断国家权力，维护旧的土地制度，农民依旧处于贫困状态，游离在经济政治生活的边缘，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除大城市外，广大农村偏远地区仍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这种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为军人崛起和军人干政提供了土壤。^④ 由于大地主和城市精英阶层不屑于参军入伍，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农民为维持生计，改变经济困顿的状况纷纷参军。例如，阿拉维人和德鲁兹人等少数民族群就有很多人为改变贫困落后、地位低下的现状而加入军队。这也使军队对于叙利亚的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由传统商人、地主主导的政治体系极为不满，从而成为军队干政和进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的深层动因。

另一方面，尽管逊尼派穆斯林人口构成总人口 72.2% 的多数，但民族、宗教的分裂现象在叙利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叙利亚社会由相互独立的家族、氏族、部族、宗派和村庄等传统社会组织构成。严酷的

① Robert Olson, *The Baath and Syria 1947-1982: 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 Party and State*, The Kingston Press, 1982, p. 41.

② Robert Olson, *The Baath and Syria 1947-1982: 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 Party and State*, The Kingston Press, 1982, pp. 44-45.

③ 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 675 页。

④ 王新刚：《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影响因素分析》，《西北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存环境使宗族部落之外的个人不具有社会存在的功能。一个人的地位取决于他在所属特殊群体中的社会关系。因此,叙利亚人不得不参加所属群体与竞争对手争夺水源、土地、房屋等必要资源的斗争。另外,内婚制、商品市场的缺乏,以及道路、电话、电报等的私人所有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群体的独立性。民族、教派认同上升为排他性的政治认同,成为叙利亚政治发展面临的尖锐问题。即便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未能弥合这种社会分裂。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等教派与逊尼派的冲突已十分严重。^① 逊尼派阿拉伯人不仅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不同宗教信仰的基督徒,还歧视和迫害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以及其他什叶派。这些宗教少数派聚居于农村和偏远山区,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遭受逊尼派地主和商人的盘剥。为了反抗统治者的歧视和迫害,经常举行武装起义。

委任统治时期,法国委任统治当局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阻止叙利亚各民族群体、伊斯兰教派的团结,利用叙利亚在宗教、地域上的分裂局面维护其既得利益,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叙利亚不同派别的隔阂。在委任统治的20余年里,法国殖民者组建所谓的大黎巴嫩,随后又设立阿拉维区、大马士革区、阿勒颇区、德鲁兹区和亚历山大勒塔特别区,并将这些地区命名为“国家”,后来又將大马士革区和阿勒颇区合并成为“叙利亚国家”,^② 试图以此削弱叙利亚的国家认同。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独立之初,叙利亚在很多方面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政治共同体,只是一个政治实体。^③ 叙利亚社会的分裂为军人干政提供了机会。

2. 激烈的政治斗争

叙利亚的社会结构亦在政治领域有所反映,即混乱的政治生态和政府管理。叙利亚社会的异质性和分裂导致政治形势的动荡。政治领导人属于一个由大地主、商人、个体经营者组成的上层阶级。一个世纪以来,他们构成了叙利亚社会中传统的城市精英。他们在法国人撤出后没有能够建立起统一的政治秩序,主要是因为他们所获得的政治支持的区域性限制及其

① Amos Perlmutter, "From Obscurity to Rule: The Syrian Army and the Baath Part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2, No. 4, 1969.

②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第209页。

③ Ma'oz Moshe, "Attempts at Creating a Political Communities in Modern Syri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26, No. 4, 1972.

支持者的特殊利益。他们的权力基础更多决定于其能否利用家族、血亲、种族、宗派和地区的支持，而不是来自于全国性的政党或政治意识形态。叙利亚政治本质上是一种个人政治、家族政治和教派政治，政治领导人因地区、个人因素发生分裂，议会和内阁沦为家族精英集团的俱乐部。政党沦为这些势力集团的私人附属物，而不是制度化的组织机构。每个势力集团都建立了自己的区域政治基础。例如，人民党的社会基础是北方的阿勒颇，国民党则是南方大马士革政治精英的代表。两大党代表的是地方利益，二者斗争结果就是国家政治中心虚弱不堪，政治精英严重分裂，传统政治权威日益瓦解。

旧的政治结构随着叙利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逐渐瓦解。叙利亚独立后现代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激发了叙利亚人的政治参与意识。由现代化催生的新的社会群体，如知识分子、律师、医生、工程师、记者、教师和学生等，要求扩大政治参与、改革传统的寡头政治、进行社会改革。但是传统政治精英们并不愿意满足新兴社会阶层的要求，因为那样做必定会对他们的地位形成冲击。同时，在传统政治系统中也缺乏能够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和机构。在既没有有效的政治机构也没有能力去发展这些政治机构的社会里，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混乱。^① 当青年人谋求改革的愿望以及争取政治参与受挫时，他们转向宪法及体制外寻找发泄不满情绪的途径，求助于激进的在野政治精英和政治组织。^② 他们纷纷加入那些主张社会改革，倡导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新兴激进政党，例如复兴党、阿拉伯社会党等。这些新兴政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1953年复兴党与阿拉伯社会党合并后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于是，当激进团体不断汲取这种不断增长的重要资源挑战传统秩序时，那些老旧政党——人民党和国民党因其狭隘性、相互对抗和组织不善而日益衰落。

总之，独立初期，在叙利亚缺乏有效政治制度的多元分裂社会里，权力是支离破碎的，政治权威不复存在。政治化、现代化了的社会团体为争

① [美]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65页。

② Fakh Mahmud A. "The Military and Polity in the Middle 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yria," *Journal of Arab Affairs*, Vol. 6, No. 2, 1987.

夺权力各显神通,但是不管哪一种政治组织都无法单凭自身的力量获得社会公认的权威。由于和其他政治团体组织相比,军队干预政治的手段具有直接性和有效性。因此,一些政治团体开始从军队中寻找突破口,在军队中宣传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组织,争取军队的支持,军队逐渐随之政治化了。

3. 叙利亚政府软弱无力

1946年独立后的叙利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诸如经济贫困、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叙利亚急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解决殖民统治遗留的问题,进行社会整合、推行经济改革、稳定社会秩序。然而,议会民主制度作为叙利亚继承的“殖民遗产”在叙利亚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西方式民主政体或其他现代化政体作为上层建筑,与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文化遗产不相适应,也与现代化初期阶段的要求不相符合,这是导致军人政变改变政体的重要因素。”^①

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叙利亚独立后的政治制度比较特殊。许多阿拉伯国家一般都是经过与帝国主义或者封建统治者长期复杂的斗争后,才逐步确立起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由于民族主义者的努力争取和法国人的刻意移植,叙利亚在独立之前就已经拥有一套不算完备的西方式议会制民主共和政体。因此,不仅叙利亚民族主义及党派在政治上具有超前性,而且叙利亚的政治制度也具有超前性。^②这种超前性与叙利亚的经济发展水平脱节,必然与其落后的经济形态产生碰撞和冲突,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扩大了叙利亚社会的分裂。传统民族主义党派继续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1947年7月,叙利亚举行独立后的首次大选并组成了以国民党为首的政府。选举前夕民族同盟分裂为国民党和人民党,两党的政治纲领并无明显区别,分裂的主要原因是部族、家族和地域利益的冲突。其他新兴政党也都带有地区、家族以及宗派色彩。除复兴党外,叙利亚各政党基本都是传统势力集团结成的松散政治组织,没有统一完善的纲领和组织系统。统治者贪污腐败、任人唯亲、滥用职权,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名不副实。

议会民主制造就了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对内既不能为国家发展建设

① 王彤:《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44页。

② 王新刚:《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影响因素分析》,《西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对外又不能很好地消除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对叙利亚的威胁。政治活动中充斥着无原则的权力斗争。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尚未形成就已夭折，有的即使已经形成决议最后也没有得到执行。激烈的政治斗争导致政府难以运作，内阁更迭频繁。据统计，从独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内阁更迭20多次。^①以1949年政变前叙利亚国内形势为例，民族党政府上台以后一直无力解决独立后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问题。1948年，叙利亚军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惨败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杰米勒·马尔丹政府在人民党的指责下倒台。随后哈西姆·阿塔西出面组织政府，同样难以协调各政治派别的利益冲突，无法弥合它们之间的分歧，分别在几天后宣告组阁失败。临危受命的阿兹姆虽然组阁成功，但由于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协商美资石油公司的管道工程项目，招致民众和议会的强烈反对。叙利亚政治局势在各种矛盾中艰难前行。

软弱和无能的政府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口实。尽管政治家不接受军人统治，但他们也赞同军队的政治活动，鼓励军官参与政治。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军人能够进行良好的统治，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军官集团能够提供一个能力出众、忠诚果断以及强有力的领导者。脆弱的议会民主政治以及强烈的地域、种族和教派关系不利于具有国家视野的政治领导人出现。于是，他们期望军队中可以产生这样的人。^②叙利亚军队正是在这种政治衰朽、外患加重、社会分化的大背景下逐步激进化并走上政治舞台的。

（二）叙利亚军队固有的属性

在西方政治实践中，军队是一个职业化的团体，军人在政治上应该保持中立。首先，军队要非党化，军队不能被个别政客、政党或者权力机构把持，从而成为其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和筹码。其次，军队要专注于自身的专业技能而不介入政治活动。最后，军队只能听命于合法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这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制度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以

① R. Bayly Winder, "Syria Deputies and Cabinet Minister 1919 ~ 1959,"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16, No. 4, 1962.

② Amos Perlmutter, "From Obscurity to Rule: The Syrian Army and the Baath Part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2, No. 4, 1969.

及政治活动的游戏规则。然而,叙利亚继承了西方的“殖民遗产”,却没有得到西方制度的精髓。由于叙利亚社会、政治具有的独特性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叙利亚军队在社会分裂和政治混乱的大环境下不可能独善其身。叙利亚军队对于政治、政党活动的参与便不可避免。

1. 军队的激进化与政治化

叙利亚军人的激进化与政治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①独立以来,叙利亚政府对建设和强化军队十分重视,不仅改组了军队的组织结构,装备几乎全部更新,军官的遴选和培养体系也发生重大变化。^②可以说叙利亚军队已经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性较强的现代化职业军队。亨廷顿认为,在一个普遍政治化了的社会中,军人干政只是众多社会现象中的一个表现形式。^③叙利亚军人干政是对叙利亚国内社会的变动,以及政治动荡的回应。叙利亚独立后,随着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推动,中产阶级以及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政治意识开始萌发。与之相应的是,整个社会的政治化。叙利亚军队征兵以及霍姆斯军事学院等军事院校向全社会开放,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纳入军队。这些新军人大多来自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军官团中的新兵完全不同于传统政治精英,与现存的政治系统没有利益关联,被排斥在权力集团之外,没有合适的途径表达自己、群体的愿望和利益诉求。中产阶级的社会背景与职业化军事教育,赋予军人的并不是传统的保守观点,而是某种程度上现代化的集体主义的思想倾向。在社会变革愿望的激励下,官兵们越来越多地卷入政治,政治观点日益激进。

另外,叙利亚是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才着手建设军队,没有其他国家那种较长的军事传统,军人极易受到各种激进意识形态和政治团体的吸引,尤其是民族主义和改革主义思潮。这一时期叙利亚政党政治比较活跃,尤其是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激进政党,如复兴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它们在军队中的活动频繁,很多青年军官深受影响。复兴党激进的政治主张对那些试图以现代民族主义构建政治体系的年轻军官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阿拉伯社会党领导人胡拉尼就非常重视发展与军队的关系,并赢得很

① 王彤:《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313页。

② [苏]H. A. 穆希基诺夫:《现代叙利亚》,祝诚等译,北京出版社,1981,第84页。

③ S.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98.

多军官的拥护。1945年5月，他曾和一些叙利亚特种部队军官一起发动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行动，并成功占领和守卫哈马要塞。^①各政党在军队中的活动促使军队逐步地激进化和政治化。

2. 少数派族群占据军队的主导地位

叙利亚军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少数族群在军队中占主导地位。叙利亚军队的主体由阿拉维人、德鲁兹人、伊斯玛仪人、库尔德人等构成。在叙利亚传统社会中，精英阶层并不把入伍从军看作获取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职业，大马士革以及阿勒颇的逊尼派上层社会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军事学院。很多穆斯林家庭认为军事院校是二流学校，因此上层社会的子弟多从事文职工作。这一方面源于上层社会崇文重商的社会传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传统精英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优势地位。军队主要来自社会的中下层。法国委任统治时期，为镇压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委任当局有意从阿拉维派、德鲁兹派等宗教少数派及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族群中招募军人，组成“特种部队”。法国殖民者组建了8个营的叙利亚新军，其中竟有3个是阿拉维营，其他部队中也大量充斥着为主人服兵役的阿拉维人，叙利亚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阿拉维派的军队。^②当叙利亚独立后，作为少数派的社会群体在军队中却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叙利亚独立后，霍姆斯军事学院向所有民众开放，没有阶级、阶层、族群等差别，不收任何费用，每月还向每个学生提供一定津贴。这些举措为那些缺少社会晋升机会的寒门子弟提供了机遇。许多中下层子弟特别是农村青年进入军事学院学习，谋求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虽然也有逊尼派子弟加入军队，使军队中的宗派比例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一般士兵和低级军官仍以出身农村的少数派青年为主。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等其他少数派别在军队中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③

由此可见，叙利亚军队在构成上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官兵多为农村出身，二是主要来自宗教少数派。叙利亚军队这种特殊的阶级、宗派、族群背景，使它比其他政治团体更了解人民的疾苦，更能反映中下层人民

① Tabitha Petran, *Syria*,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p. 89.

② 殷昱：《阿萨德父亲和他们的叙利亚》，《世界知识》2005年第7期。

③ Beeri Eliezer, *Army Officers in Arab Politics and Society*, Praeger, 1970, pp. 336 - 337.

的利益诉求,具有较强的革命性。他们出身农村,但是在军事院校和军营中接受教育又使他们构成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军队因此成为联系农民和中产阶级的纽带,它与农民阶层的天然联系在中产阶级发动农村力量进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少数派军官能够成功夺取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此。

3. 巴勒斯坦战争对军队的影响

1948年5月15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包括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约旦等国的阿拉伯军队相继参战,并在战争初期取得胜利。由于美国等国家的干预,阿拉伯军队先胜后败,被迫签订停战协议。叙利亚军队成为唯一没有在此次战争中被击败的阿拉伯军队,并占领和控制了呼勒湖和太巴列湖之间的三小块区域。但是局部的胜利无法改变战争最终惨败的结局。战争的失败对阿拉伯国家造成了极为广泛的影响,“甚至是最细微的政治经济问题都渗透着这一事件的影响”。^①对年轻的阿拉伯官兵来说,战败是一种耻辱,它标志着埃及和叙利亚的原有政治体制开始走向终结。^②在埃及,自由军官们用四年时间筹划和实施政变,扫荡了国内旧秩序。叙利亚军队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军队将领们带着屈辱回到国内,抨击国内腐败的政治制度,指责政治家们要对战争的失败负责,并要求就失败的原因展开调查。巴勒斯坦战争彻底改变了阿拉伯军队的性质。他们像其他地方的军官一样开始认为,只有他们才能体现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的荣誉感,为此他们不得不进入政治领域,通过军队的力量来反对政治集团。叙利亚军队特别是军官集团迅速转变为一个政治意识空前强化的政治团体。

(三) 国际及地区政治的冲击

叙利亚西邻地中海,位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岛之间,地处肥沃新月地带的中部,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区,被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核心。这种特殊地位使叙利亚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大国争夺和控制的重点目标。叙利亚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军队不可避免会受

① R. Hinnebusch, *Authoritarian Powe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Ba'athist Syria: Army, Party, and Peasant*, Westview Press, 1990, p. 29.

② G. H. Torrey, *Syrian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1945 - 1958*,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35.

到国际、地区形势的影响和渗透。

1. 大国对叙利亚的争夺

二战结束后叙利亚虽然获得独立，但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和控制。战后，英、法实力受到严重削弱，逐渐退出中东，但仍以各种方式最大可能地保持在叙利亚地区的既得利益。在美苏对峙格局下，叙利亚在美苏冷战以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等周边强国角逐的夹缝中挣扎。

叙利亚的战略地位和政治长期动荡不符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① 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一方面向中东渗透以填补英法撤退后留下的空白；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削弱和阻止苏联在中东影响的扩大，打击地区强权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为此，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第四点计划”、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9号决议，第5428号决议、“艾森豪威尔主义”等有关中东的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并不是专门针对叙利亚，但其基本内容也同样适用于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国家。为防止叙利亚倒向苏联，美国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介入叙利亚政治。由于美国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偏袒以色列，叙利亚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美国“阿美石油公司”管道工程项目迟迟得不到叙政府的批准。经过多次谈判无果后，美国政府失去耐心，授权中情局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在叙利亚策划军事政变，建立亲美的新政府。美国中情局在大马士革的站长迈尔斯·科普兰和驻叙武官斯蒂芬·米德开始接触叙利亚军队中的右翼军官，叙总参谋长扎伊姆成为他们争取的主要目标。此后，米德与扎伊姆先后进行了6次秘密会晤，商讨政变问题。科普兰曾在《国家游戏》一书中称，美国人组建了一个“政治行动小组”，帮助扎伊姆策划政变。这个小组还将扎伊姆称为他们的“美国男孩”。^②

最终，美国中情局的秘密行动促成了1949年3月的扎伊姆军事政变，打开了叙利亚军人政变之门。为围堵苏联，美国又在1950年和1952年筹组“中东司令部”和“中东防务组织”，并计划把叙利亚纳入其中，但两计划相继夭折。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重新拼凑围堵苏联的中东军事联盟“北层联盟”，并最终于1955年建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一举动遭到了叙利

① Douglas Little, "Cold War and Covert Ac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yria 1945 - 1958,"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44, No. 1, 1990, p. 51.

② [Http://news.21cn.com/caiji/roll/2012/07/19/12415664.shtml](http://news.21cn.com/caiji/roll/2012/07/19/12415664.shtml).

亚的强烈反对。为迫使叙利亚改变立场,美国联合土耳其进行武力威胁。然而这些行动却激起了阿拉伯人更加强烈的反美情绪,驱使叙利亚进一步左转,更加亲近克里姆林宫。^①为遏制这一趋势,1956年美国决定对叙利亚实施“散乱行动”,基本内容是利用土耳其、伊拉克在外部进行武力威胁,美国中情局则诱导叙利亚国内的亲西方军队发动政变。但是随着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散乱行动”随之夭折。美国秘密干预叙利亚政治的活动事实上加强了复兴党和左翼军官中的反西方和反美力量。1957年,艾森豪威尔主义出台后,遭到叙利亚的公开反对,为迫使叙利亚改变立场,美国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在经济手段不能奏效后,美国开始策划“徽章行动”。美国官员斯通试图用金钱收买叙利亚军官发动军事政变,但是佯装被收买的叙军官密报政府。阴谋暴露后,叙政府驱逐了3名美国外交官,叙美关系恶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中东战略直接影响冷战背景下的苏联中东政策。^②杜鲁门“第四点计划”及“艾森豪威尔主义”出台后,由美国导演的反苏反共浪潮反而加速了苏联对中东的渗透。苏联力图通过扶植盟友、慷慨的援助,挑拨、破坏美国与中东国家关系,以达到美苏均势的目的。外部因素诱导叙利亚军人干预政治的情况,直到1963年复兴党掌握政权后才有所缓解。在此之前,叙利亚军事政变虽然说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总的来说外部因素不可忽视。1963年复兴党上台后,军人集团干预政治的原因多源于复兴党及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发展道路之争。

2. 地区政治的影响

英国叙利亚问题专家、著名记者帕特里克·希尔曾在其著作《对叙利亚的争夺》中讲述了1945年至1958年的阿拉伯政治。正如题目所暗示的那样,他认为任何试图支配中东的当地大国或者域外大国,都必须控制中东的核心叙利亚。^③

一方面,叙利亚面临的安全难题客观上需要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

① Douglas Little, "Cold War and Covert Ac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yria, 1945 - 1958,"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44, No. 1, 1990.

②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第423页。

③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第316页。

演重要角色。作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前线国家之一，叙利亚直接面临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军事上长期与之处于对抗状态，随时都有受到以色列进攻的危险。险恶的外部生存环境使叙利亚认识到必须拥有一支强大实力的武装部队来抵御以色列，因此将军队现代化、提高其战斗力视为保证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这种一定意义上的“先军政治”使叙利亚军队具有较强的政治能量，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自然有所提高。一旦对外战争失利，军队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高涨，对现有政体形成冲击。巴勒斯坦战争的失败就是叙利亚1949年第一次军事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埃及、伊拉克等国为争夺阿拉伯世界霸权都将叙利亚视为重点争取的对象。叙利亚时常陷入两者的斗争之中，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军队中也相应出现了亲伊拉克派和纳赛尔的追随者，两派斗争也增加了军队的不稳定性，一旦斗争激化很容易造成军事政变。地理因素决定了伊拉克对叙利亚的兴趣。20世纪40年代以来，为争夺中东霸权，伊拉克就一直试图把叙利亚纳入一个由自己主导的“肥沃新月”联盟中。^①另外，叙利亚是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石油管道的必经之地，鉴于伊拉克南部出海口十分狭小，这条输油管道的安全关乎伊拉克的经济命脉。因此，伊拉克一直希望在叙利亚建立一个亲伊政权为自己的地区利益服务。但是由于伊拉克的亲西方立场，叙利亚和它的关系并不友好，伊拉克多次参与颠覆叙利亚政府的政变。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纳赛尔的声望在阿拉伯世界如日中天，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纳赛尔也十分重视叙利亚。长期以来，纳赛尔努力将叙利亚控制在西方影响之外，并在叙利亚军政部门培植亲纳赛尔的复兴党人和军官。1957年，叙利亚面临国内外困境，迫使其日益加强与苏联的关系，这也是纳赛尔不愿看到的。在复兴党和军方代表的劝说下纳赛尔同意埃叙两国合并，建立“阿联”。“阿联”解体后，纳赛尔又号召叙利亚国内的亲纳赛尔军官推翻政府，建立埃及式的革命政权。叙利亚国内纳赛尔派军官一直具有较强的实力。

① 王红霞：《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研究（1949—1961）》，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第19页。

三 叙利亚军人政治的主要特点

比较政治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军队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军事组织存在,军队的发展变化对国家的现代化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某些国家甚至具有决定性作用。土耳其和埃及的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具有过渡性、非制度性、对抗性和不稳定性等特点,军人政治在不同国家所呈现的特点与作用也不尽相同。就叙利亚而言,军人政治反映了叙利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及其变迁历程。

(一) 军队派系斗争激烈、政变频繁

叙利亚军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①不同于埃及军人政治精英,叙利亚军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团体,容纳了来自叙利亚各个民族、宗派、地区、阶级、部落的成员,来自社会底层的穷困子弟与富有而有权势的家族子弟拥有相同的升迁机会。军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市与农村、贫困阶层与富裕阶层之间的差距。然而,这也使叙利亚社会的多样性与分裂型内化为军队内部的派系。叙利亚军队从建立之初就因民族、教派、部族、地区、个人因素等分裂为许多派系小集团。各军人集团为了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不断争权夺利。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派系也不断地分化组合,它们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为叙利亚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重要原因。

在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少数派军人与逊尼派阿拉伯人的斗争最为激烈。复兴党军官于1963年夺取权力前,少数派宗教和族群在军队中占据主导地位。^②阿拉维派、德鲁兹派等在军队中所占比重远远超出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这种不对称性成为少数派群体与逊尼派军人之间长期矛盾冲突的根源。少数派构成军队普通士兵的绝大多数,在军队中所担任的职务一般为中下级军官。相反,逊尼派军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一般都是身居高位,

① Amos Perlmutter, "From Obscurity To Rule: the Syrian Army and the Baath Part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2, No. 4, 1969.

② Nikola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Assad and the Baath Party*, I. B. Tauris, 2011, p. 26.

把持关键的岗位。少数派军官被排斥在高层权力集团之外，没有军事决策权。宗教少数派官兵也因此一直受到逊尼派军官的打压。因此，叙利亚前三次军事政变领导人胡斯尼·扎伊姆、萨姆·辛纳维和阿迪卜·希沙克里全部都是逊尼派军人。^①为了维持统治，扎伊姆和希沙克里皆依靠具有相同民族和宗教背景的军官。在希沙克里的统治下，许多来自其出生地哈马的军官迅速进入军队高层。逊尼派军官贾西姆·阿尔万曾回忆，希沙克里曾敦促他优先接收逊尼派穆斯林青年进入霍姆斯军事学院学习，并尽可能地限制少数派所占的比重，阿尔万拒绝了这一要求。在“阿联”之前，叙利亚军官集团分裂为多个派系，这些派系主要由逊尼派领导。

宗教少数派军官则利用对基层官兵的控制及其与他们的密切联系暗中积蓄力量。一旦获得升迁，这些军官就开始任用亲属和同一宗派的亲信，帮助他们升迁，或进入陆军、海军或空军学院学习，少数派军官的势力逐步增强。1962年后，少数派军官的不利地位才得以扭转，主要原因是霍姆斯会议后以纳赫拉维为首的大马士革逊尼派军人集团骨干力量被驱逐。1963年3月8日政变后，阿拉维派军官在军队领导岗位中的比重发生了重大改变，尽管叙利亚军官团仍以逊尼派出身为主，但非逊尼派成员如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军官在军官集团、军队精英以及高层中的地位大大增强。1965年以后以及1966年政变中，阿拉维派军官已经控制了军队高层和复兴党左翼，逊尼派军官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多次遭到清洗。复兴党政权建立后，因对逊尼派军官不信任，大多数重要职位都控制在阿拉维派等少数派军官手中。一些逊尼派军官即使占据某些重要职位，也无实权可言。阿萨德政权建立后，除极少数绝对忠于阿萨德的逊尼派军官外，大多数逊尼派军人都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2011年以来的叙利亚危机中，叛逃的叙军高级军官之所以以逊尼派为主，也是因为他们对在以阿拉维派为主体的军队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感到不满。

除宗教少数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派系斗争外，在不同历史阶段，叙利亚军队中还存在着不同派系分化且各派力量此消彼长的现象。独立初期，英美等国为控制叙利亚纷纷在叙利亚扶植代理人，叙利亚军队出现亲美派和

^① Nikola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Assad and the Baath Party*, I. B. Tauris, 2011, p. 28.

亲英派,最终引发了1949年的三次军事政变。1961年“阿联”解体后,叙利亚军队至少分裂为复兴党左派、主流温和派、纳赛尔主义者以及逊尼派军官集团等不同的政治派别。1963年3月8日,复兴党军官联合纳赛尔主义军官、部分独立派军官发动了军事政变。复兴党执政后,复兴党军官又先后把纳赛尔主义军官和独立派军官清洗出军队,实现了对军队的控制。此后,复兴党军官内部又因政治观点不同发生权力之争,分裂为激进派和温和务实派,两派分别以地区委员会副总书记贾迪德和国防部长阿萨德为首。最终阿萨德通过军事政变击败贾迪德夺取了叙利亚国家的最高权力。

叙利亚军队中激烈的派系斗争导致军事政变频繁发生,叙利亚也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军事政变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其烈度堪称中东之最,以至于被称为“政变国家”。据统计,从1949年扎伊姆首次政变到1970年阿萨德通过政变推翻贾迪德政权,叙利亚共发生了9次成功的军事政变。这些军事政变彻底改写了叙利亚独立后的政治发展进程。^①

(二) 军人政治与政党政治的结合

军人政治与政党政治相互结合是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又一突出特点。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军人政治和政党政治是一对天敌。但是在叙利亚独特的社会、政治秩序下,出于各自的需要,军人集团和政党,特别是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新兴政党,很早就建立起密切联系。最终军队和复兴党形成了“军政合一”的特殊的军政关系。

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扩大往往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暴力工具的军人具有短时期内建立社会秩序,稳定政局的能力。但是,军人高度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使得职业军人在自己的领域内成为具备特殊技能的专家,而在自己的领域之外却成为十足的外行。^②职业化、责任感、团体性这三大特征强化了军人作为一个相对封闭而自主的职业化团体的性质,也决定了其在军队外部具有十分有限的影响力。因此,叙利亚军人虽然能依靠暴力推翻文人政府,却不具备民众动员、社会整合、行使政府职能的能力,只好借助政党的力量。另外,为了增加政权

① 王京烈:《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48~53页。

② 陈明明:《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20页。

的合法性，军人也不得不把某个政党推向前台，披着民主的外衣躲在幕后进行政治操控。1949年，辛纳维和希沙克里政变后，都做出还政于民的姿态，组成了人民党主导下的文官政府。1951年，希沙克里甚至组建了由军人主导的政治党派“阿拉伯解放运动”，企图以此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脱离“阿联”后，军事政变的领导人纳赫拉维同样组织了以人民党为主的政府，而自己则另组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监督政府。事实证明军人与政党的结合是非常脆弱的，由于缺乏组织，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不同，两者的合作关系很快就会因权力争夺而崩溃。

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政治势力垄断政权，许多新兴政党被排斥在权力集团之外。军队强大的实力也引起了这些新兴党派的注意，于是开始对军队进行拉拢和渗透，将军队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工具。阿拉伯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通过争取军官支持以及将该党成员送到霍姆斯军事学院等方式向军队渗透的政党。独立前，叙利亚著名的政党领袖胡拉尼便与叙利亚青年军官保持紧密的联系，鼓动他们投身民族独立运动。1936年，胡拉尼加入了阿拉伯社会民主党。尽管他在两年后离开，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并受益于该党与军队的联系不得而知，但是这一段经历无疑非常有价值。在随后的时间里，不论何时军官们玩弄政治阴谋诡计，胡拉尼都没有远离这一群体。^① 1945年，胡拉尼创建阿拉伯社会党，该党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主张铲除封建主义和改善农民境况，倡导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因此得到了广大农民和青年军官们的热烈拥护。叙利亚独立后，胡拉尼又成功促使霍姆斯军事学院向所有阶层的开放，并由政府向学生提供补贴。得益于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胡拉尼成为在年轻军官中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②

叙利亚军人政治和政党政治相结合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复兴党的崛起。复兴党政权源于军事政变，军人与政党的密切结合是复兴党的突出特征。^③ 军队与复兴党的合作是因为双方共同的政治利益需求，即争夺最高政治权力。要实现这个目标，复兴党需要具有强大实力的军队的支持，以改变在

① Nabil M. Kaylani, "The Rise of the Syrian Ba'th, 1940 - 1958: Political Success, Party Fail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 No. 1, 1972.

② Tabitha Petran, *Syria*,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p. 89.

③ 哈全安：《中东史》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657页。

政治角逐中的软弱地位,军队则需要借助复兴党的组织机构、意识形态和领导能力。

首先,复杂的派系斗争使军队四分五裂,各派系中的分歧和个人主义刺激了军官们的个人野心。他们试图利用政党力量整合军队,加强军队的团结,进而扩大军队的群众基础,增强其干预政治的合法性。其次,复兴党拥有军队所欠缺的政治优势。复兴党创立于1947年,以统一、自由、社会主义三大原则作为意识形态的基本纲领,主张超越教派之间的狭隘界线,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政治联合和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强调发展国有经济和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提倡土地改革和社会公正。因此,它在农村人口、城市中下阶层、宗教少数派、青年军官和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广泛影响力,拥有很强的社会号召力和动员能力。除完善的指导思想外,复兴党还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其中复兴党民族委员会是复兴党在阿拉伯世界的最高领导机构,下设若干地区委员会作为复兴党在阿拉伯各国的执行机构。1958年,复兴党已经发展成为阿拉伯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政治组织,在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等国建立了分支机构。

复兴党虽然是叙利亚最早的现代民族主义政党之一,但是起初却很难吸引民众和赢得议会选举。领导人阿弗拉克在1949年担任辛纳维政府的教育部部长,但这并没有增强该党在选举中的影响力。在1949年11月的选举中,阿弗拉克又丢掉了在议会中的唯一席位。1954年10月希沙克里政权崩溃后的首次自由选举中,复兴党获得了15%的选票和22个议会席位。^①1959年7月“阿联”的民族联盟选举期间,在9445名候选人中只有250名复兴党党员当选。^②因此,复兴党为增强影响力不得不选择与军队合作。事实上,1945年到1958年,胡拉尼和阿弗拉克就试图利用军队作为复兴党的政治工具。1954年阿德南·马勒基及其同僚达成了军队与复兴党之间的第一次联盟。随着国内斗争的日益激烈,复兴党和军队的联系也日益密切。1963年,复兴党利用军队夺权上台后,与军队形成了一种“军政合一”的关系:军队通过复兴党干预政治,维护军方利益,在国内外政治事务中拥有很大发言权;复兴党依靠军队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各项政策

① 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 - 195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82.

② Tabitha Petran, *Syria*,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p. 134.

方针的实施。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因此具有浓重的军人政治色彩。

（三）军人政治与文官政治交替出现

1949年后，叙利亚文官政府丧失了对政权的控制，野心勃勃的军事强人开始介入叙利亚政治。叙利亚政权因此在军人集团和文官势力激烈的角逐中几易其手，军人政治与弱势民主交替出现。在1970年阿萨德上台之前，叙利亚共经历8年议会民主制（1945~1949，1954~1958）和5年的半议会民主制（1961~1966）。长期的军人干政和短期的议会制、半议会制交替主导叙利亚政局，其间文官政府始终处于军人政变的威胁之下。^①

叙利亚议会民主制的超前性决定了其文官政治的虚弱不堪，它既无力解决叙利亚面临的各种问题，又无法在与军人集团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但是文官势力也不可能将权力拱手相让，必定会抓住一切时机对军人进行反击。同时，军人因其自身职业特点和迫于舆论的压力也无法彻底取代言官政府。军人虽能依靠暴力颠覆文官政府，但其所建立的政权却缺乏合法性基础，因此无法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很容易被新的政变所推翻。军事独裁统治被推翻后，文官集团则会利用国内民主呼声高涨、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有利时机增强自己的实力，要求军人返回军营，退出政坛，恢复文官统治。军人迫于压力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但随着斗争的加剧，特别是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军人就会发动新的政变取代言官政府。于是，叙利亚就陷入了军人政治与弱势文官政府交替统治的恶性循环，这种状况直到阿萨德执政后才得以扭转。在与文官集团的政治斗争中，军人可以说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叙利亚发生的9次成功政变中，只有3次军人在政变成功后将权柄交还文官集团，并号召军人返回军营。1963年，“三·八革命”宣告了叙利亚议会民主制的终结，表面上军人在推翻议会民主制后将政府交给了复兴党的文官，但是军人却是实际上的王者。阿弗拉克、比塔尔等复兴党元老派文官领导人最终被掌握实权的复兴党年轻军官所取代。

贾迪德和阿萨德的冲突成为叙利亚文官政治家与军人政治家斗争的转折点。1966年，贾迪德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复兴党元老派后，把主要精力转

^① Amos Perlmutter, "From Obscurity To Rule: The Syrian Army and the Baath Part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2, No. 4, 1969.

移到复兴党党务工作上,成为文官政治主张的代表。他重组复兴党领导机构,以复兴党地区委员会副书记身份在幕后操纵党政大权。阿萨德则增强了在军队中的威望和影响。两人围绕国内外政策展开新一轮角逐。在国内政策上,贾迪德优先注重发展经济,认为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为解放被占领土做好充分准备。另外,贾迪德集团在国内大谈阶级斗争,并向其他阿拉伯地区输出革命。他认为通过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将被传播到各地,到那时阿拉伯地区的统一才有可能实现。贾迪德政府将其他阿拉伯国家分为革命的和反动的两个类型,并宣称只和前者合作。贾迪德政府在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宣传阶级斗争的同时,拒绝和国内的民族主义力量妥协合作,例如纳赛尔主义者、共产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者。

阿萨德及其盟友穆斯塔法·塔拉斯认为,贾迪德政府的政策有失误。在阿萨德的计划中,军队发展要优于经济的发展,尽管他最后宣称这两方面应给予同等的关注。他不反对贾迪德的阶级斗争理论,但是希望与其他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合作。他还通过寻求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以扩大复兴党的统治基础。阿萨德支持一些有利于中小商人和投资者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在对外关系上,阿萨德则希望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合作,尤其是与埃及的合作。唯有如此,才能收复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因此,他反对贾迪德的“革命—反动”的标准。在军事战略上,阿萨德反对人民战争的口号,支持塔拉斯的常规战理论,将民兵组织作为一种辅助力量置于军队之下。^①在1968年复兴党地区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阿萨德提出叙利亚应该放弃激进的外交政策,缓和与相对保守的阿拉伯产油国之间的关系,以换取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缓和与伊拉克、约旦之间的关系,组成反对以色列的“东方阵线”等主张。但他的提议遭到大会拒绝。1969年2月25日,阿萨德策动了一次有限的政变,抓住以色列空袭大马士革附近村庄的时机,占领了报社和广播电台,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这迫使复兴党地区委员会向阿萨德妥协,国际上叙利亚开始缓和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国内则与其他进步政治团体开展合作;颁布临时宪法;选举新的地区委员会,给予贾迪德派和阿萨德派相同的代表权。同时,满足了阿萨德的愿望,筹组

^① John Galvani, "Syria and the Baath Party," *MERIP Reports*, No. 25, 1974, p. 9.

和成立了由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和约旦部队组成的东方指挥部。^①

贾迪德和阿萨德之间的权力斗争在1970年达到顶峰。贾迪德借巴勒斯坦游击队与约旦政府军交战之机，试图利用复兴党地区委员会紧急大会将阿萨德调离军事岗位。贾迪德操纵大会指责阿萨德等两位军事领导人违背党的原则，制造双重权力结构，妨碍党的决议的执行，拘禁党员，审查党的信件。特别是指控阿萨德寻求并执行一条“失败主义的反动路线”。^② 1970年11月13日，以阿萨德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以贾迪德为首的文官政府，结束了自1966年以来两驾马车的国家权力模式。^③ 随着阿萨德总统权威体制的确立，军队和复兴党文官主导的党政机构之间实现了互相依存、制约的关系，二者都没有独立的权力分配和控制的实力。叙利亚军人政权与文官政府交替上台执政的局面得以终结。

（四）军人政治与民主化的复杂关系

叙利亚军人政治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于军人政治的认识不能简单地只是就该术语的含义而论，而必须着眼于军人政治在具体实践中对民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军人干政阻碍了叙利亚既有的议会民主制的发展进程，并使之最终消亡。现代议会民主制政体虽然十分脆弱，与叙利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但它毕竟代表一种先进的民主制度，军人干政有悖于民主政治的原则，军人政治的产生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嘲讽。军人当政期间许多措施也都严重违背民主精神，有时甚至带有军事独裁色彩。1949年，扎伊姆政变后就解散了议会和政府，对内实行严格的军事监察，压制各种社会民主运动，甚至取缔所有的政治党派。希沙克里军事独裁时期甚至取消了最高法院。复兴党在“三·八革命”后，实行紧急状态法并长期不予取消，压制国内的民主运动，因此受到国内民主势力的指责。阿萨德家族依靠军队的支持长期控制叙利亚政权，将其他政治势力和党派排斥在权力体系之外，必要时还采取暴力方式镇压其他党派。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因为阿萨

① Robert Olson, *The Baath and Syria 1947-1982: 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 Party and State*, The Kingston Press, 1982, p. 119.

② Tabitha Pet ran, *Syria*,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p. 248.

③ 刘畅：《二战后中东国家的军人与政治》，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第19页。

德政权的军人政治色彩而将其视为最专制独裁的政权之一,并希望用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对其进行外部改造。

其次,军人政治表现出一定的民主改革性质,扩大了叙利亚社会的民主政治参与程度。在叙利亚议会民主制下,民主仅限于上层社会的传统政治精英,是少数人的民主。普通民众被排除在民主政治之外,毫无权力可言。军人集团代表的是广大中产阶级和中下层社会民众的利益,他们向寡头政治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叙利亚社会的政治参与。1949年,军事政变推翻了代表传统政治精英利益的议会政权,使政治参与由原来人数相对较少的上层集团扩大到中间阶层。值得一提的是,扎伊姆还首次给予妇女选举权,这是妇女政治权力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代表中下层人民群众利益的复兴党军人执政后,更是在各方面扩大了人民的民主权利。20世纪70年代阿萨德上台后,进一步完善复兴党的组织体系,将复兴党的活动范围扩大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城乡基层群众,强化与城市下层民众、农村居民之间的政治联盟,体现了农民、工人、官僚和军人之间的广泛政治联合。1972年,阿萨德建立起驾驭社会和控制民众的政治组织——“民族进步阵线”。该组织是复兴党主导下的政党联盟,是叙利亚民众参与政治、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渠道。

最后,一个稳定的政权不一定产生民主,但是民主的推行却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权和安定的局势。^①叙利亚独立后动荡的政治局面宣告了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失败,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结束混乱状态,军人适时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军人统治者通过放弃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打破了旧有的传统社会秩序,推动了叙利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军事强人所代表的现代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是叙利亚由传统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迈进的过渡阶段,军人政治带来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为叙利亚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化道路创造了条件。1992年3月,阿萨德就曾发表讲话,声称民主制不是随意进口和出口的商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亦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他强调叙利亚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叙利亚历史和文化基础上的民主制,尚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不符合叙利亚的具体国情。

^① 王林聪:《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368页。

（五）军人政治与地区局势相互影响

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兴起与发展深受中东地区形势的影响。同时，叙利亚军人的政治活动又对中东政治局势，特别是对巴勒斯坦问题、阿以和平进程、黎巴嫩问题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军人作为最早接触现代化并从中受益的社会集团之一，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现代化过程中，他们容易受到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熏陶和感染，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在军队中广泛流行。第一次中东战争惨败彻底激发了叙利亚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治意识。战败的屈辱强化了军人集团积蓄力量打败以色列、解放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复仇愿望。巴勒斯坦历来被具有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叙利亚统治者视为“大叙利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叙利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长期与以色列对抗且态度强硬，这必然要以军队的强力支持为后盾。叙利亚参加了多次中东战争，虽屡遭失败但从没有放弃追求阿拉伯统一的努力。叙利亚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包括防御型和进攻型两种形式：防御型是指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联合和合并来实现阿拉伯的统一，进攻型是指利用战争达成统一目的。^① 1958年叙埃合并，以及1976年后叙军在黎巴嫩的长期驻军是上述两种方法的运用，而这两次实践正是在叙利亚军方支持和主导下进行的。

1976年，阿萨德利用黎巴嫩内战之机，派遣3.5万名军人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进驻黎巴嫩，同时进入的还有大量的安全机构人员。在之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叙利亚军队长期驻扎黎巴嫩。叙利亚军队和安全机构人员利用黎巴嫩各派之间的矛盾左右黎巴嫩局势，保持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控制以及在黎的战略利益。例如，维护其在黎境内的经济利益，将黎巴嫩纳入大叙利亚计划和实现阿拉伯统一的目标，将黎巴嫩作为一个缓冲地带以防范以色列的进攻。2005年4月26日，在国际社会和美国的压力下撤回所有驻军和安全机构，叙利亚多年苦心经营的叙黎“特殊关系”遭到巨大挫折。但这并不意味着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彻底失败，黎国内仍有亲叙的政治派别和叙利亚安全机构的情报人员，仍可以对黎巴嫩施加影响。正

^① 韩志斌：《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及其影响评估》，《西亚非洲》2005年第4期。

如巴沙尔所说,即使叙利亚不在黎巴嫩驻军也可以在黎发挥影响。^①

自埃及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后,维持阿以战略平衡的任务落到叙利亚头上。叙利亚一直战斗在对抗以色列的第一线,拥有阿拉伯世界仅次于埃及和伊拉克的武装力量。一定的军事实力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也增加了叙利亚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对以色列保持有效的军事威慑,并在叙以和谈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谈判进程。巴沙尔认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将是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最佳筹码,至少可以促使以色列归还侵占已久的戈兰高地。^②叙以和谈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一环,没有叙以和平中东就不可能实现全面持久的和平。^③

结 语

叙利亚军人自1949年扎伊姆军事政变开始,军队不断卷入国家政治生活,通过一次次军事政变彻底扭转了叙利亚政治发展的方向。1949~1954年,军队成为军事强人实现政治野心的强大工具,扎伊姆、希沙克里的军事独裁统治严重冲击了脆弱的议会民主制政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兴衰成败与军人的政治活动也有莫大的关联。1963年,复兴党和军队联合发动政变,夺取国家政权,叙利亚政治制度朝着“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转变。1970年,阿萨德执政后,通过对军队、复兴党组织和官僚机构的巧妙控制实现了对国家的稳定统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军人干政,但阿萨德政权对军事安全机构的严重依赖使其带有浓重的军人政权色彩。

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兴起既有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也有地区、国际形势影响的外部因素。在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军人政治作为国家权力的更替形式,既是叙利亚社会动员和民众政治参与严重滞后的逻辑结果,也是新兴政治精英挑战传统政治精英垄断权力和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进程的必要环节。叙利亚社会独特的二元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导致

① 转引自 *Washington Observer*, March 2, 2005。

② 程松:《重建可靠国防力量的里程:锻造大马士革弯刀——西方军事观察家眼中的叙利亚国防力量报告》,《国际展望》2004年第14期。

③ 王新刚:《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另一环:叙利亚的困境与争衡》,《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社会氛围异常紧张。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与叙利亚政治发展水平不相符合，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冲突与动乱。文官政府的无能决定了叙利亚只能依靠军队来压制冲突、稳定秩序，从而为军人政治的兴起开辟了现实的道路。巴勒斯坦战争改变了叙利亚军队的性质，军队由单纯的军事组织转变为日益政治化、激进化，具有革命性质的团体。冷战格局下，美苏争夺世界霸权以及埃及、伊拉克等中东强国角逐地区霸权的斗争促使他们通过军事、经济、技术甚至阴谋等手段来笼络地处中东核心地区的叙利亚，具有强大政治能量的军队自然成为他们重点拉拢的对象。叙利亚军队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也使得各派系军人极易接受外部力量的诱导。

亨廷顿认为在变化的社会中，军人的政治角色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越落后，军队承担的政治角色就越进步；社会越进步，军队可能就会越来越保守甚至反动。军人集团的政治化程度与文官政治系统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能力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

当传统文官集团无法解决变化的社会所积累的各种矛盾时，军队确实具有在较短时期内恢复社会秩序的能力。军人政治也就成为重建政治权威的潜在手段。复兴党执政之前，军人集团作为原有社会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和革命者出现在叙利亚政治舞台上。复兴党执政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参与基础的扩大，复兴党政权日益巩固，军队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军队的政治角色趋于保守。特别是阿萨德政权建立后，致力于通过复兴党建立一支“意识形态纯粹化”的军队，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和职业化建设。军队由过去政治斗争的仲裁者变成政权的守护者，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大为降低。由于军人政治角色的两面性和多变性，其对叙利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军人政治是现代化政治力量的代表，其统治政策反映出强烈的世俗化、现代化倾向。一方面，叙利亚复兴党上台执政后，由于大多数军人具有乡村背景和宗教少数派色彩，军人执政时期推行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改革政策，例如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运动具有明显的激进色彩，造成了叙利亚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推动了叙利亚现代化的历程。另一方面，军人刻板僵硬的统治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逐渐成为社会经济进步的障碍，甚至引发社会经济危机。其次，军人通过军事政变夺权与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破坏了原本脆弱的议会民主制。一方面，统治

者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一些压制社会民主的措施表现出其政治独裁的一面；另一方面，叙利亚军队代表了社会中下阶层的利益，军人政治无疑扩大了社会民主的适用范围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军人政权通过牺牲一些民主和自由换取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和平的政治环境。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东政治民主化趋势逐步加快，军人政治面临的处境日益不利。中东一些军人政权有的被国内的民主运动推翻，有的被迫实行多党制，军人放弃了权力。在中东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特别是随着 2011 年新一轮政治危机的爆发，叙利亚军人的政治角色重新敏感起来。在社会民众民主化的压力下，叙利亚统治当局可能会向民主势力做出某些让步。但无论局势朝哪个方向发展，就叙利亚政治发展水平而言，军人政治都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同埃及一样，叙利亚军人集团仍是一支可以改变时局的关键力量。

[责任编辑：闫伟]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Syrian Stratocrac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Wang Xingang, Yan Peng

Abstract: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Syria in the mid-20th century, stratocracy, mainly referring to military personnel interfering with politics,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factor of Syr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Before the Baath Party stepped onto power, the military group played the role of destroyer and revolutionist of old social systems; While after the Baath Party obtained power, the military forces changed into vested interests, their political roles tended to be conservative. Assad, since his presidency, set to establish an army with “purified ideology” through the Baath Party, which strengthened the grip of the army and made it more professional. The army also changed from an arbitrator among political struggles into a safeguard of the government. The number of coups reduced dramatically. The popularity of stratocracy in Syria has close relations with its social disorder and vacuum in power. Meanwhile, it also reflected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Syrian troops, the tendency of its 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the regional politics. Although stratocracy got rid of the frequent coups and instability at the beginning of Syrian independence, in a long run, stratocracy is in an opposite direction with democracy. It, to a large extent, constrains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in Syrian, and in the meantime, it has influence on regional military conditions.

Keywords: Syria; Stratocracy; Baath; Alawites; Authoritarianism

On the Roots of Political Crisis in Algeria of the 1980s

Ci Zhigang

Abstract: Algeria drew the world's attention for her political crisis in the late 1980s, for Islamic Salvation Front had challenged traditional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sparked continuing violence. The historical root of the political crisis is as follow: firstly the transplanted development model had brought about political instability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modernity; secondly the national identity characterized by elite politics and nationalist narratives had been challenged; finally the collis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culture led to the lack of spiritual core in the nation-state building on this background. Algerian political crisis has failed to build a modern nation-state and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modern one.

Key words: Algeria; Political Crisis; Elite Politics; Islamic Movement

Tunisian Party Politics and Democracy Reform

Li Jingqiang

Abstract: Party system is vital in the politics of Tunisia as an authoritarian state, and here the changes of status and character of the ruling party is extremely pivotal. The Neo-Destour's status as ruling party, which formed in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became the leader of Tunisian modernization, though it had to make adjustments because of the democratization wave. The "revolutionary", "builders" and "reformers" are the special roles this party played in the past 54 years. In spite of the change of roles, the party had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thus governed the country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When it failed to deal with deep-seated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meet citizens' need for democracy, the party